無畏的前行—陳仁和的時代與他的建築

The Intrepid Enlightener: The Architecture works of Chen, Jen-Ho's inspiring Life.

柳青薰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Liou, Miguel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建築」是人類對於社會環境最直接的回應方式，不僅反應現實條件的物質限制，更要服務社會文化的期待與想像，除了滿足生活模式的機能需求，還得傳承歷史的文化脈絡，同時蘊含對於未來的理想與企圖。「建築」不會只是呈現建築師個人意志的設計創作，型式美學的背後必然是社會意識與價值判斷共同交織的成果。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政經局勢發展，臺灣在很短的時間內經歷過政權快速更迭的劇烈變化，形塑社會型態複雜且多元的鮮明性格，各種不同的族群文化隨著時間的演進，不斷的編寫進島嶼的歷史之中，生活模式的融合痕跡體現在各式各樣的建築設計上，成為描述各個不同時代風景的語彙。

儘管臺灣從清末光緒年間開始，就已經有不少小規模的現代化嘗試，但真正進入全面性的體質改變，實際上還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因循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西化進程，徹底脫離廣義以漢人文化為主體的治理策略，從而走向一個與傳統文化幾近斷裂的發展軌跡。這種來的既快速又猛烈的改變，不僅是生產與技術上的革新，更底定臺灣終於脫離海尾角國的宿命，以前所未有的寬廣視野面對正在現代化的新世界，然而這股看似突

陳仁和正在繪製鳳山農會肉品市場平面圖

飛猛進的日式現代化浪潮並沒有持續太久，太平洋戰爭生硬的在1945年畫上一條再清楚不過的界線，除了回歸已經不太熟悉的祖國，臺灣再次被迫接受另一波陌生的美式現代化力量。這種不斷被動式的進行各種現代化社會改造的宿命，對於近代以來的臺灣來說，似乎是一種有點無奈的兩難。

「折衷」一詞意味著極為明顯妥協的模糊意圖，有著無法被具體明確框選的定義，清楚的標誌著臺灣多元文化融合的歷史脈絡，建築作為一種專業技術，在臺灣並沒有相當久遠的歷史，除了具有明顯風土性特質的原住民建築外，較具規模的技術發展，約略是起源自清代以降，由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所進行的各種修造工事，真正進入明確制度化分工的職業性發展，並且擴展成為具有建築教育功能的專業體系，仍然是基於日治時期為了治理需求而開始的各項建設。而戰後受到美援的指導而展開的復員工程，以及跟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籍建築人才，則是延續著日治時期的基礎，徹底的將臺灣的建築體質改造，逐漸走向與傳統反向的現代化之路。

每一個伴隨治理需求而進行的建設，必然會因為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的影響，以及內含相當程度的

伴隨治理需求而進行的建設，必然產生具有明顯時代特色的建築形式與風格

只要離開臺北或是主流以外的地方，絕大多數的建築師是沒有名字的專業者

宣傳與教化意圖，而產生具有明顯時代特色的建築形式與風格，但社會性的發展脈絡無法像政治的更迭那樣，完美的切分成每一段清楚的時間斷代，這也是為甚麼臺灣當前的各級城市中，幾乎都保有為數不少混雜多種時代風格的折衷樣式建築，很難以一種單純或是統一的語彙加以區分或描述。對於戰後初期的臺灣建築界來說，像是王大閎或是楊卓成這種背負國家期望的名字，才是廣為社會所知的建築師，可以像是巨星般的橫空出世，憑藉著天分與令人稱羨的機會，不斷的完成各式各樣的建築作品，但只要離開臺北或是主流以外的地方，絕大多數的建築師是沒有名字的專業者。

由於臺灣在日治時期之前並沒有專業建築師制度，就算在日治時期「殖產興業」的治理策略下，所謂的建築專業人員，指的是包含出身帝國大學與各工業學校的技術官僚，以及龐大的建築工手們所構成的職業體系，但不論在工作項目與責任義務的內容上，都與今日的建築師所職掌的有明顯差異。臺灣現行的建築師制度是在戰後隨著國民政府來臺後才引進，初期甚至被歸類在工業技師的項目底下，一直要到1971年才頒布專法，明確規定建築師的相關責任義務，因此真正建構戰後第一代建築師的主力成員，主要是以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大陸籍建築人才，或是海外留學接受建築教育培養後歸國者為主，其中「陳仁和」是最為特殊且重要的建築師之一。

王俊雄與徐明松在《粗曠與詩意：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一書中，定義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作品主要來自三類建築師，其中陳仁和被歸類於「在臺灣出生，在日本受教育」的類型（王俊雄、徐明松，2008），三者最主要的分類依據在於接受建築教育訓練的歷程不同，強調學歷對設計能力與執業型態的相互影響關係。而傅朝卿認為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師最主要的特質，在於「他們在現代主義國際式樣的時尚下，努力地想以專業者的角色，以專業者的方法，創造一種新的帶有傳統風格的現代建築」，將陳仁和列為臺灣戰後第一代的五位建築師之一（傅朝卿，2010），但不論哪一種分法都可以發現，陳仁和都是少數臺灣本土出身，知名度與討論度也都是最低的非主流建築師。

陳仁和建築師與兄弟合照（左二坐者為陳仁和）

陳仁和於1922年7月20日出生於澎湖廳馬公支廳白沙庄吉貝大字，父親陳量原本以經營漁船隊的家族事業維生，上有一個姊姊，下有兩個弟弟與一個妹妹。八歲的時候父親受澎湖西嶼小池角仕紳鍾鉅委託，隻身前往臺灣屏東慈鳳宮附近經營舊大和旅社，由於陳量認為臺灣本島的教育資源遠較澎湖完善，而且自身事業也日益穩定經濟能力逐漸厚實，隔年便舉家遷移來臺定居，陳仁和原本在澎湖就已經就讀公學校，也因此轉學來臺一路從阿緱公學校唸到高雄中學。陳量在1937年時著手籌建新大和旅社，根據家屬回憶陳仁和

建築師自述，他對於建築的興趣正是啟蒙自這時的生活經驗，影響日後前往日本留學時，毅然決定以建築為志願的契機。

由於臺灣在戰前的教育體制並不完善，大多數本島人能唸到中學校者相當少，儘管設有臺北帝國大學作為高等教育機構，但實際上大部分臺灣學子在公學校畢業後就會投入業界，繼續升學者大多以師範或是其他實業學校為主，因此具有一定經濟能力以上的家庭，大多將子弟送往日本留學。陳仁和於1940年前往日本東京留學就讀預科，就時程上來看，陳仁和留日的時間點已經是日治晚期，當時對於海外留學生的規定與制度，以及各種求學資訊相對較為完善，因此整體留學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臺灣籍學生人數遠多於臺灣本島，甚至含括各學制的總體留學生人數也屢創新高，但由於戰爭一觸即發，依然對臺灣留學生造成不小的壓力與影響。

然而留學日本的的花費頗鉅，並且為了考量日後的職業生涯，同時受限於學力不足的影響，臺灣人真正要能直接進入大學就讀者並不多。日本政府於1903年發布敕令61號《專門學校令》，許多戰前的舊制大學紛紛設立專門部，形制近似舊制官立單科大學，由於入學較為容易，僅要求中學校或實業學校以上資格即可入學，修業期限又短，大多只要三年即可畢業，因此成為日治中後期臺灣留學生的熱門選擇，甚至形成所謂「法科明治、政經早稻田」等名門(紀旭峰, 2009)。但整體而言，臺灣留學生主流的進學目標仍不脫醫學、法科以及商科等傳統科系，像陳仁和這樣選擇建築作為志願者，在整個日治時期的留學生發展脈絡中來看，是相當少數也相當另類的特例。

臺灣留學生主流目標仍不脫醫學、法科以及商科等傳統科系，像陳仁和這樣選擇建築作為志願者，在整個日治時期是相當少數也另類的特例

根據學籍資料的紀錄，陳仁和於1942年進入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理工學部建築科就讀 (紀旭峰, 2009)。早稻田大學是兩度擔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受到明治時代六大教育家之一的福澤諭吉建議，繼承北門義塾的基礎，在1882年以「東京專門校」為名創立，並於1902年獲得許可定名為「早稻田大學」，1920年再根據《大學令》升格為舊制大學，至今仍與慶應大學並列為日本私校兩大名門之一。早稻田大學於1910年設立理工部建築科，由佐藤功一擔任總長，是日本在戰前包含海外殖民地在內的22所設有建築科的高等教育學校之一，同時也是僅次於東京帝國大學、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之後，創建年代第三早的傳統名門，戰前臺灣籍校友並不多，最廣為人知的是1950年倡建「臺灣省建築技師公會」的林慶豐建築師。

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理工學部建築科創立於1939年，由被稱為「耐震構造之父」的內藤多仲擔任總長，網羅包含岡田信一郎、佐藤武夫、今井兼次等重量級建築家擔任師資，教學陣容華麗程度絲毫不遜色於東京帝國大學建築科。早稻田大學專門部建築科採三年學制，主要教學目標為深化技術訓練，培養高等工業人才，早稻田大學建築科則是以教育具有獨立思考，兼具藝術創作能力的建築家為主要目標，因此專門部建築科的畢業生只要完成畢業設計，但大學部建築科除了畢業設計之外，需要再寫專題論文才能畢業。早稻田大學專門部工科於1949年終止招生，原本業務併入新制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

陳仁和領取第一屆十大建築師獎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如果從早稻田大學專門部工科的歷史發展來看，陳仁和就學期間處於已經成熟發展的穩定期，與他同屆的專門部工科畢業生已有20餘人之多，顯示當時就讀於大學專門部已經是相當盛行的風氣，但受到當時太平洋戰爭的影響，陳仁和在畢業後不久就返臺，隨即被網羅至當時由宮本清利擔任校長的高雄州立高雄工業學校擔任教諭，並且隨著政府改制為省立高雄工業職業學校，留任建築科與土木科教師及科主任，甚至兼任訓導主任與教務主任等教職。有趣的是終其一生，陳仁和並沒有與前身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成大建築有過太多交集，事實上他的教學生涯也於1947年結束，根據家屬回憶與當時陳仁和之所以離開學校，與多次鼓勵學生挺身抗議不公事件，以及後來的228事件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離開教職的陳仁和並沒有閒賦太久，隨即被早稻田大學的學長林慶豐建築師引薦，進入「臺北市政府房產委員會」擔任專員，負責設計與建造的業務，兩個月後又因為謝東閔的關係，外借轉調「臺灣省政府日產清理處」，負責戰後日產接收的鑑價與相關建築業務，並經歷機關改制歷任「臺灣省政府公產公物管理委員會」，以及「臺灣省政府公產管理處」等單位。由於臺灣戰後初期的社會狀態並不穩定，經濟起伏變化相當大，再加上物資極度短缺，因此實際願意投身業界的人並不多，大多也以較有營利的工礦公司或是私人企業為主，然而處理日產接收在當時被視為「肥缺」，有心者很容易球員兼裁判的中飽私囊，因此陳仁和的公職經歷在當時應該相當令人稱羨。

陳仁和與其任教高雄工業的學生合照

原本應該平步青雲官場得意的陳仁和，因為父親陳量認為他的公務員生涯，與原本栽培他赴日留學的初衷相差甚遠，況且本身並非貪圖非分之財的個性，因此強烈希望他辭去公職另謀發展，當時臺灣省政府在1948年起開放「臺灣省籍土木建築技術人員」的技師登記，但由於要求大專以上學歷以及三年實務工作經驗，且不承認日治時期的紀錄，因此造成臺灣人強烈反彈，隨後於1950年再度修訂「臺灣省建築師管理補充辦法」，先行授予「臨甲」或「臨乙」等執照，並依規定一年內要取得經濟部登記的技師證書，方能繼續執行業務。但陳仁和由於留日的相關學經歷，早在1949年7月就已經通過「高等考試工業技師檢覈」，取得建築技師資格，並於隔年申請加入第一屆「臺灣省建築技師公會」準備開業。

中華民國考試院於1952年施行「臺灣省土木建築技術人員考試」，相關制度一直沿用到1971年公布「建築師法」後才有變動，將專業身分認定從「建築技師」定名為「建築師」，根據1958年的《臺灣省建築技師公會會員名冊》資料顯示，當時共有183名會員，而跟陳仁和一樣留日學歷的共有35位，大多設籍於臺北，高雄只有陳仁和一人。如果從高雄的城市發展歷史脈絡來看，成長於屏東的陳仁和，之所以會選擇高雄作為職業的起點，是不難理解的選擇，由於高雄經歷過日治時期的重點建設，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基礎，高雄同時也是最多澎湖移民聚居的城市，在各種社會資源與人脈的建立上，相對較為容易也更有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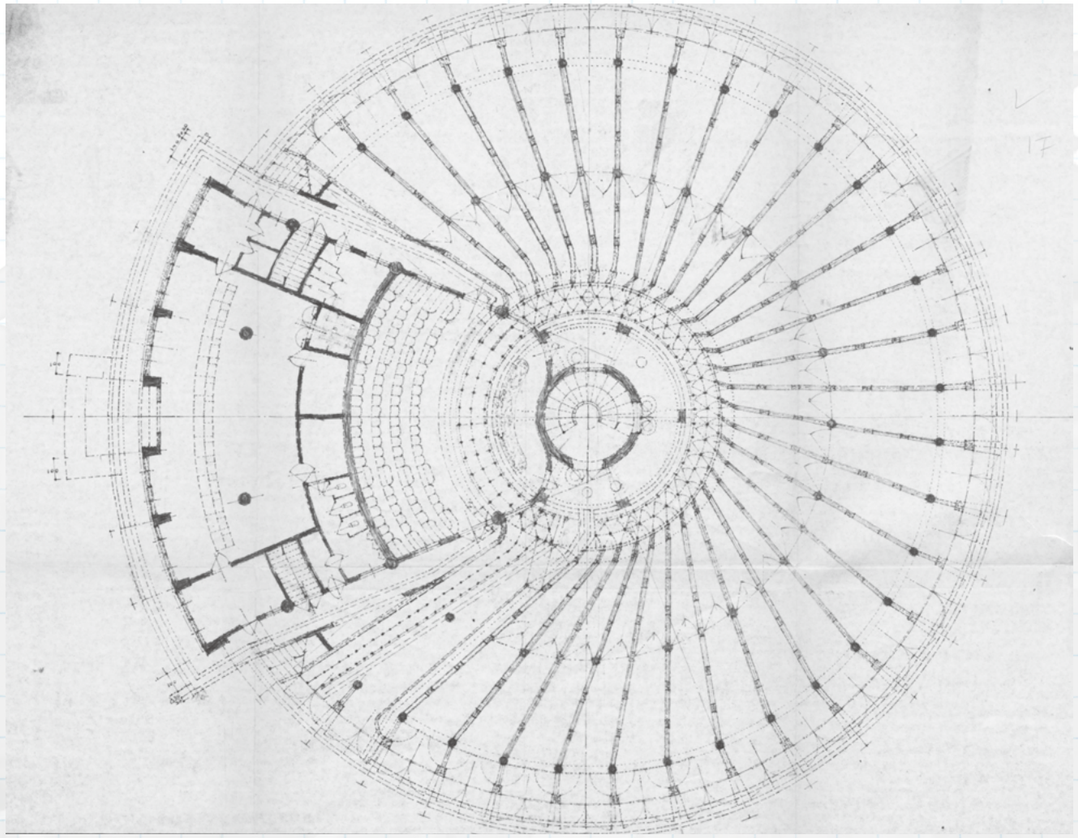
第一代的陳仁和建築師事務所坐落於北野町一代，大約是今日七賢二路與壽星街交界周圍，在與人合租的日式木造宿舍裡，利用起居室改造而成，1952年受早稻田大學建築科學長陳清全委託，設計位於苓雅區成功路第五派出所後方的二層樓透天連棟住宅，並分得其中一棟作為住所，此案不僅為陳仁和第一個正式的設計委託作品，同時也是第二代建築師事務所的所在地，並在此處完成讓陳仁和一戰成名的高雄佛教堂設計案，可謂是陳仁和的發跡之處。隨著子女陸續出世，陳仁和在1954年與姐姐合購位於前金區七賢二路與自強一路交界處的土地自建住宅，在1966年事務所再度搬遷到錦田路之前，陳仁和此生大部分具有明顯個人創作意圖的作品，都在此處完成。

陳仁和建築師事務所錦田路時期

陳仁和的建築事業發展與高雄的城市擴張有明顯的關係，從最早的鹽埕，跨過高雄川後依序從苓雅、前金、新興的遷移過程，其實是順應著高雄市區商業中心位移的軌跡，這種具有開拓意識的前進型事務所經營模式，反應出高雄的城市與建築發展脈絡下，建築師順應著案源移動的經營策略，凸顯出高雄城市建設在戰後的發展過程，民間能量遠大於政府主導的有趣現象，而陳仁和生涯所有的建築設計案，幾乎沒有政府的公共工程作品，多少也再次驗證了這個事實。如果就規模與架構來看，陳仁和的建築師事務所屬於小型，員工人數最多不超過30人，早期甚至只有他自己與幾位雄工的學生組成，員工不支薪但事務所提供食宿，有點像是傳統師徒制的方式，到中後期因為事務所業務量大增，才轉變為支薪上下班制的制度。

陳仁和生涯所有的建築設計案，幾乎沒有政府的公共工程作品

影響陳仁和建築師事務所選址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容易取得同鄉或是資源的支持，不論是最初的鹽埕或是最後的新興區大港埔，都是高雄市區澎湖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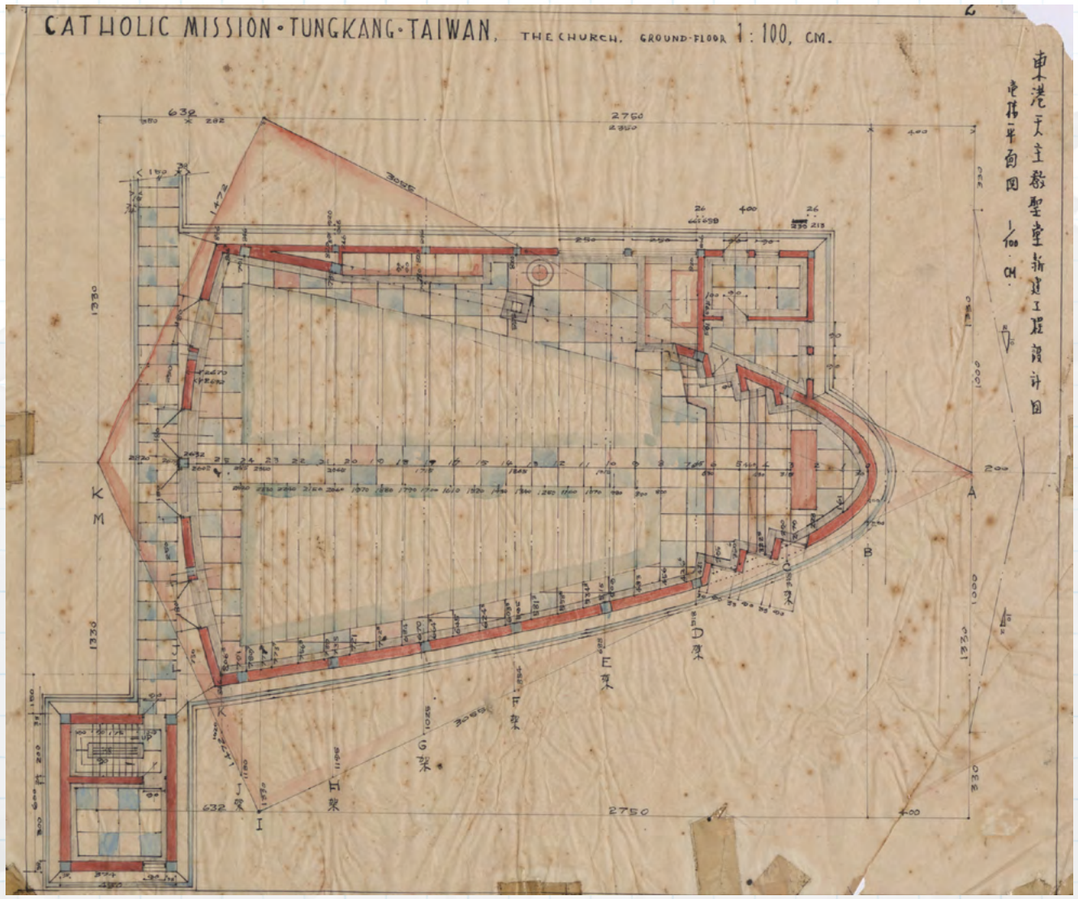

鳳山農會肉品市場平面圖

鳳山農會肉品市場模型

的主要聚落，不少澎湖移民來臺後也都從事營建業，以新興區的事務所所在地大港埔為例，周圍就住了許多來自澎湖文澳的澎湖人，而且大多從事水泥匠作等相關行業，因此容易形成一個基於同鄉情誼而建立起來，並擴展為各項技術支援的專業團隊，這一點從負責陳仁和事務所各種案子的營造廠，大多都為澎湖人所經營就可以看出端倪。然而，對於陳仁和來說，利用同鄉情誼的好處並不是為了利益的分配，自己人可能比較好說話的自私打算，而是為了有助於他能夠盡可能實現自己的設計理想。

不論是高雄佛教堂、三信家商波浪大樓、東港天主堂、大同國小舊禮堂、或是鳳山農會肉品市場等較為知名的案例，都可以看出陳仁和對於建築設計投入相當大的心力，但根據相關建築登記資料或是發包文件顯示，這些建築作品的造價都在幾近成本的限制下完成，大多數都經歷過多次流標，經過陳仁和四處奔走透過個人交情請託，最後由澎湖同鄉所經營的營造廠以底價承攬的慘烈過程。如果再考慮到戰後初期的物價波動，以及資源相對短缺的險峻形勢，所以「大多只跟澎湖人合作」的慣例，背後所隱含的是陳仁和為了完成設計與實踐理想的強大意志力，而他令人驚艷的建築設計能力，其實也不全然是藝術與天分的展現，反而是為了解決問題的深思熟慮。

對於陳仁和來說，利用同鄉情誼的好處，可能是為了有助於實現自己的設計理想



經過陳仁和細部發展後的東港天主堂平面圖

高雄佛教堂室內景象(林一宏攝)

星雲法師曾經在個人著作中回憶當年高雄佛教堂創立時的辛苦，在戰後物資極度缺乏的狀況下，能夠由信徒自發性的募集資源興建，是相當得來不易的事情，根據陳仁和家屬的回憶，陳仁和是在參與高雄佛教堂的建築設計後，正式成為虔誠的佛教徒，一般人容易因為高雄佛教堂極為特殊的立面造型，認定陳仁和是參考西式教堂的形式做法來完成設計，但實際上陳仁和是透過對佛教史以及教義的深入了解後，創造出一個兼具造型與功能，同時能夠在預算額度內完成的完美設計，這種因地制宜並且量入為出的設計模式，正好與當時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年輕僧侶一拍即合，不以追求名山大院為目標，強調一種積極入世走入常民生活的靈活性傳教策略，因此陳仁和持續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型態的佛教性建築形式，陸續實踐在一系列的設計作品之中。

佛教的入世觀點不只影響陳仁和對於建築形式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透過建築來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態度，因此從作品中可以清楚發現，儘管陳仁和大抵上仍然依循現代主義以及現代化形式的脈絡，逐步發展自己的事業，但他除了宗教性的建築作品以外，並不注重形式語彙的堆砌，反而是回到機能與造價的現實考量，盡可能地創造出兩者兼顧的雙贏局勢，這種專注於解決功能性問題的設計策略，加深了陳仁和只能地域性發展的窘境，甚至是一種帶有覺悟性的轉身背對時代主流，不急於陷入當時過於喧鬧的建築型式與文化意義的詮釋語境，像是以一種獨語呢喃的樣子，透過建築設計來描述他的時代，這種近似大乘佛教利己利人的社會意識與個人哲學，實際上才是形塑陳仁和建築設計獨一無二的關鍵因素。

陳仁和絕對是臺灣戰後建築史上最特殊的建築師之一，但並不全然是因為藉由強大的結構計算能力以及藝術天分而實踐的建築設計，而是隱含於背後熱忱的想要改善社會的社會意識。陳仁和在唯一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提到:「建築家必須要自覺自勵—我們是站在能以創作，完成人類至上真善美立場的」。這種迫切意識到自己具有改善社會能力的自覺，使他義無反顧決心肩負起藉由建築設計來實踐淑世理想的人生道路。這對於大部分只將建築視為是藝術性的表現，認為個人的理想在於追求形式與美感的突破的建築師而言，是一種難以理解的孤傲。長期以來包含建築界在內的主流輿論對於陳仁和的忽視，以及他自身因為過度專注而產生的沉默，如今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以及建築人對自我期許的多元成長，陳仁和反而像是先行者般的，屹立在時代的前方啟發我們。

文件顯示，這些建築作品的造價都以在幾近成本的限制下完成，背後所隱含的是為了完成設計與實踐理想的強大意志力

王俊雄、徐明松。(2008). 粗獷與詩意: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臺北: 木馬文化。
紀旭峰，(2009)。戦前期早稲田大学の臺湾人留学生，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論集，147-183。
傅朝卿，(2010)。從陳仁和作品原創性、建築構成術觀察戰後臺灣第一代建築師作品中傳統風格的差異性，臺灣建築雜誌，172 陳仁和逝世20周年紀念特輯。